本版编辑：杨志梁
E-mail：m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经济学家

从选择角度看成本

□ 王东京

前篇文章写利润，这里再谈成本，其实我知道读者对成本不陌生，这里老生常谈，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学界目前对成本的解释不一致，需要梳理和贯通；二是自己多年来对“从选择角度看成本”有些思考，希望与大家切磋。当然观点不一定对，知无不言，算是抛砖引玉吧。

我看到的成本定义，说法很多，但归纳起来有两个：一个是指生产和销售一定产品耗费资源的货币价值，如原材料耗费、工资支出、固定资产折旧与管理费等，简称料、工、费；另一个是指作一种选择而放弃另一种选择的最高代价。显然，前者指的是价值耗费；后者则是从选择角度看成本，经济学称之为机会成本。

实不相瞒，怎样将以上两个定义贯通，这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30年前，我做研究生时曾请教过教授，教授说，料、工、费是财务成本，机会成本是经济学讲的成本。怎么回事？难道财务成本与机会成本是两种成本？不应该呀。但若不是两种成本，两者又该如何打通？我翻阅过多种教科书，却始终也未找到答案。

也是时来风送滕王阁。做研究有时真得靠点运气与灵感。前不久赴广州调研，在参观一家工厂时老总介绍说，由于用工成本升高，他们正考虑用机器替代部分人手。一语点醒，我忽然想到财务成本原来可从选择的角度看。若果如此，财务成本当然也是机会成本。

说到机会成本，人们很容易想到的是李嘉图。当年李嘉图在论述分工时，提出了比较成本。所谓比较成本，是指生产某产品具有相对优势。举例说，某人既能耕种，又能织布，还能养殖，但生产效率却各不同。假定投入相等，耕种的收益为100元；织布的收益为150元；养殖的收益为120元。设若如此，他会选择织布，而织布的机会成本，就是放弃养殖的收益120元。

事实上，再往前追溯，机会成本的定义最早应该来自亚当·斯密。至少可以肯定，李嘉图曾受过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启发。其实，绝对成本与比较成本并无太大差别，两者皆是作比较，只是比较的参照不同：前者是自己与别人比；后者是自己与自己比。所以在我看来，机会成本的最初源头是绝对成本。



到底机会成本由谁提出，读者可以再考证，而我这里要解释的是，财务成本为何是机会成本；更具体地说，财务成本中的原材料、工资、折旧费等，站在什么角度看它们是机会成本？由于工资成本最为典型，让我先说工资吧。

工资是企业雇工的费用，其高低由劳动力供求决定，看上去，工资成本似乎与机会成本无关。是的，单个劳动者的工资确实要由劳资双方定，但请注意，企业作投资选择的依据并非个别工资，而是总工资。以汽车组装厂为例，汽车组装既可雇人工做，也可用机器人做，雇人工得付工资，用机器人要购置设备。假如企业选择雇工，则雇工的机会成本就是机器人可带来的收入。

可见，雇工是有机会成本的，问题是雇工的机会成本与工资是何关系？回答此问题，还得借助上面的例子：假定用人工组装的收益是一千万元，而使用机器人组装的收益是八百万元，企业若选择雇工，其机会成本为八百万元。换句话说，这八百万元（机会成本）就是企业选择雇工可接受的总工资。若总工资低于八百万元，企业会多雇工，否则就会少雇工。当总工资达到一千万元，企业会考虑重新选择。

原材料成本与工资成本类似，只要原材料有替代，企业可以选择，使用原材料也有机会成本。比如煤、电、气三种燃料可相互替代，于是企业便有三种选择。若选择用煤，机会成本是放弃用电或气的代价；若选择用电，机会成本则是放弃用煤或气的代价。这个道理不难懂，我不多解释。

真正的困难在怎样看折旧，折旧不存在选择，折旧怎会有机会成本？不过想深一层，企业建厂之初买何设备却可选择，从这个角度，设备投资也有机会成本。但要提点的是，企业在选项目时设备投资是成本，但一旦投产则为沉没成本。经济学讲沉没成本应从利润回收，不能作成本补偿。这是说，折旧费并非成本，当然也无机会成本。

综上分析，从选择的角度看，所有成本皆可理解为机会成本，如此一来，成本的定义也就贯通了。但贯通定义只是目的之一；本文的另一目的，是要推出下面三点结论。

结论一：机器代替人工是必然趋势。雇工的机会成本是放弃使用机器的收益，机器的收益越高，雇工的机会成本就越高。现实是，从最初的半自动机器到后来的全自动机器、再到今天的智能机器，其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于是雇工的机会成本也不断升高。很多人以为机器替代人工是因为人工成本高，恰恰相反，是机器收益高而推高了雇工的机会成本。

结论二：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不可逆转。选择一种能源的机会成本是放弃使用其他能源的代价。伴随科技进步，各种新能源逐步出现，如传统的能源是煤；后来慢慢便有了电、油、气，而今天又开发出了各种生物能源，经验表明，新能源不仅比传统能源更环保，而且收益也更高。

结论三：反暴利或管制价格徒劳无益。投资某项目的机会成本是放弃投资其他项目的代价。如投资甲项目收益是一亿元，投资乙项目收益是九千万元，则九千万元就是投资甲项目的机会成本。判断企业投资是否暴利，不能以投资多少论，而应从机会成本看。任何以投资少为由批评企业暴利的言论，皆属无稽之谈。

热点透析

如何面对TPP

□ 徐程锦　顾　宾

2015年10月5日，美国等12国经贸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结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TPP谈判历时5年多，从一开始即广受关注。TPP的影响力不仅来源于成员国巨大的经济体量，更在于其致力于打造“21世纪国际经贸规则”的战略定位。TPP规则的特点在于议题新、标准高。与我国已经加入的区域贸易协定相比，TPP不仅涉及传统贸易议题，还涉及诸多与贸易有关的新议题；不仅将货物、服务贸易开放水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还试图在具有“道德”意义的环境、劳工、国有企业等议题上取得突破。

TPP在国内舆论界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评论层出不穷。其中有三类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一是阴谋论，认为TPP是美国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手段，中国将被挤出亚太经贸圈。二是冲击论，认为即使中国不被孤立，对外贸易也将受到重大冲击，出口受挫。三是速入论，认为中国应当尽快加入TPP，一方面可以享受TPP规则带来的贸易便利，另一方面可以复制当年加入WTO的经验，以国际规则倒逼国内改革。如何看待这三种观点，在当前TPP详细文本尚未公布的情况下，有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但一个基本判断不会改变，那就是，无论阴谋也好，阳谋也罢，以及中国将受到多少冲击或者在谈判中将要付出多少代价，根本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实力。

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国家实力来源于四个维度：深广的国内市场、活跃的对外投资、富有创新精神和竞争力的企业、良好的法治环境。过去30多年，我国主要扮演出口国和国际投资东道国角色，出口创汇和吸引外资使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经贸体系。但是，中国的实力要向更高水平迈进，还需要创造深广的国内进口市场并成为活跃的全球投资者，作为全世界的买家和金主参与甚至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企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只有富有创新精神和竞争实力的企业才能抵御开放带来的冲击，进而走向国际市场。良好的法治环境是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法律制度透明、程序简捷、执行力强，不仅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也有利于培育本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和竞争力。依这四个维度衡量，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国家。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多样性，以及美国企业长期对外贸易投资的实践经验，为其提供了提出国际贸易新议题的丰富素材，并使其具有主导国际规则制定的实力。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实力尚有差距，但正在迅速进步，迎头赶上。提升我国实力的根本途径，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别无他途。TPP的规则与我国改革开放方向相契合，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第一，我国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过程中，将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这与TPP倡导的政策目标基本一致，符合TPP投资章节和竞争政策章节的核心理念。我国目前正在与美国商谈双边投资协定，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为谈判基础，符合TPP规定要求。第二，TPP在技术性贸易壁垒、规则协调等多个章节中制定了旨在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规则，同时也注意保护成员国政府为促进公共政策而对经济进行合理管制的权力。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与此同时加强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宏观调控，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这与TPP规则的基本精神一致。第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设立专章要求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行最严格的损害赔偿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及时公布环境信息。TPP则要求成员国加强环境执法，不得以损害环境为代价获取贸易和投资优势，甚至明确规定环境争议属于TPP争端解决受案范围，这与《决定》精神是契合的。

尽管TPP的基本原则与我国改革开放方向有相通之处，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应马上加入TPP。对于TPP，我国应持续紧密关注，根据国内改革进展，适时选择加入，最大限度降低为加入付出的代价。以国有企业章节为代表的部分TPP规则还可能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产生潜在冲突，对此应加强研究，审慎应对。鉴于所有TPP成员国都有国有企业，TPP承认国有企业，且其规则义务只适用于商业类国有企业，对公益类国有企业不作要求。但是有两条值得注意：一是要求国有企业的采购和销售只能基于商业考量，换言之，不能基于政府意志；二是承认国家对国有企业的非商业援助，但要求不得损害其他成员国利益。这两方面与我国的国有企业政策可能存在冲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并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无论是商业类还是公益类国企，都必须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总体要求，优化国有资本重点投资方向和领域。即使是商业类国企，其经营行为也不能仅依据商业考量，服务国家战略是我国国企政策的底线。另外，为使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政府不可避免要给予各类支持，很难保证不对其他市场主体造成负面影响。国有企业问题事关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尽管TPP的国有企业规则允许各国做出例外保留，对于如何协调《指导意见》与TPP相关规则的潜在冲突，仍需全面而慎重的评估。

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TPP为正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又增加了一重外部不确定因素，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面对TPP，我国的基本态度应当是有信心、有定力；基本原则是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具体方针则应当是审慎评估，适时加入。

宏观观察

重塑经济增长动力

□ 郭　威

回顾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改革开放后的30年，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9.9%的平均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由于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变化而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虽然目前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科学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为一个社会人口结构中，由于劳动人口增长率高于非劳动人口增长率的而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口红利既来自于人口绝对数的增长，也来自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城市化不仅将大量人口带入新的消费模式，也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制度因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画出了一条前所未见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从这条曲线可以看出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占整个社会总人口数量的比重逐步上升，降低了被抚养人口比重，从而增加的劳动力数量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由于资本积累、资本深化以及资本存量调整使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增强而带来的资本红利。通过比较经济增长的四部门模型中的各个变量，可以看出我国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特征。投资之所以增长快速，最重要的原因是投资收益率非常高，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资金供给方来看，我国早期的金融结构较为单一，金融系统主要以银行部门的形式存在，居民、政府和企业没有过多的投资渠道，只能将资金存放在银行部门作为储蓄，同时，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人为地压低贷款利率，利率作为资金的使用价格显得相对低廉；另一方面，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日常生活用品，都非常匮乏，导致几乎任何投资都有利可图，再加上当时世界经济增长较快，欧美等发达国家为国内投资增加而扩大的产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提振了外需，也为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无论是哪一方作为投资主体，较低的融资成本都伴随着较高的投资收益，使得最终的投资收益率非常高。

第三，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而带来的技术红利。技术的不断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不断升级，正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决定因素，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发达国家自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处于世界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带来巨大财富增长的背后都需要自身研发而耗费大量投入，一旦创新失败，引起的风险对于创新主体来说往往是难以承受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使得我国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方式获得成倍于他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必承受很大的风险，这也被称之为“后发优势”，中国凭借这种优势获得了长期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反思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下降

在分析了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速度的原因之后，就能比较容易理解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何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期的快速增长之后逐渐显露疲态。

第一，人口红利拐点显现，人口红利正在消失。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相关专家预测从2010年到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接近20%，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将只用20年达到，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计划生育，1978年到2008年，出生率被压低，人口抚养比升高，同时也减少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也就是说，计划生育政策既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又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第二，投资回报率下降，资本红利日益减少。在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边际投资收益递减，也就是说，投资效益并不随投资规模的盲目扩大而递增，而是达到某一临界点后，收益会递减。以此来看，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投资回报率下降，而产能过剩就是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最好的注解。该问题不仅出现在钢铁、煤炭和水泥等传统产业，太阳能、风能等新兴产业同样面临产能过剩。甚至在铁路、公路以及机场等基础设施领域，同样面临投资收益率严重偏低的问题，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是外需与内需的同时下降。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数量直线下降，很多产品供大于求。同时，国家虽然实施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但用于教育、医疗等改善民生领域的数额较少，对于提振内需极为有限。另外，投资收益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的供给方的结构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

第三，技术创新不足，技术红利逐步缩小。首先，自2001年加入WTO，中国在引入大量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大量国外的先进技术，加之自身的技术创新和进步，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日益缩小。其次，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加速度使得国际上其他国家不得不引起高度警惕。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一半，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时候会更具针对性，用更加严格的和隐蔽的方式限制中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美国政府最近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区域构筑的新的国际贸易投资体系，即TTIP与TPP，实际上就是通过新的规则进行约束和限制。中国从国外获得先进技术的成本和风险都显著增加。

重塑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

首先，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来看，人口红利消失的趋势是难以转变的，人口老龄化总会到来，但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减缓这种趋势，延长人口红利。第一，从长远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全面放开，即允许所有家庭生育二胎。有的学者担心一旦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会激增人口数量，其实，由于生活、教育和医疗等成本的提高以及新生代家庭生育思维的转变，实行“全面二胎”从长远看不会对人口总量造成较大影响；第二，注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推进教育制度改革。现在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假设人们还愿意生育，要长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也得15年甚至更久，难以改变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因此，应该从过去强调劳动力数量转变为更加注重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不断推进教育制度改革，比如现在就业市场表现为很明显的结构性失业特征，大学生数量供大于求，而专业的技术工人供不应求，这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只有人尽其才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

其次，投资收益率下降并不意味着投资不重要，关键取决于投资主体、投资方向和资金转化效率。从投资主体来看，政府在很多投资领域中依然扮演着主要角色，资源的配置方式依赖于行政指令。比如，在当地政府通过土地、贷款等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无锡尚德迅速成为国内最大的光伏企业，但随着投资刺激政策的退出，最终不得不宣布破产，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政府主导投资的行为方式；从投资方向来看，之前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资源开发、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而服务业相对较少，特别是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文化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从资金转化效率来看，要继续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赋予民营企业获得同等金融服务的权利，使得资金要素能够自由充分的流动，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

最后，技术创新是提升整体产业结构，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在过去人口红利的依赖下，中国不具备大规模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但是在人口红利消失，各个生产要素成本提高的条件下，必须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一是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是创新的首要制度保障，没有相关的保护，就会有“搭便车”行为，创新行为得不到长期的、常态化的鼓励，终难获得持久动力；二是打破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性业务，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建立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创新市场环境。

